

# 二次大战

## 十大事件

周 乾 乌传袞编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十大事件

周 乾 乌传袞编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登记证号:(皖)01 号

责任编辑:周子瑞      装帧设计:丁 明

## 二次大战:十大事件

周 乾 乌传袞 编著

---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南陵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 插页:2 页

版次: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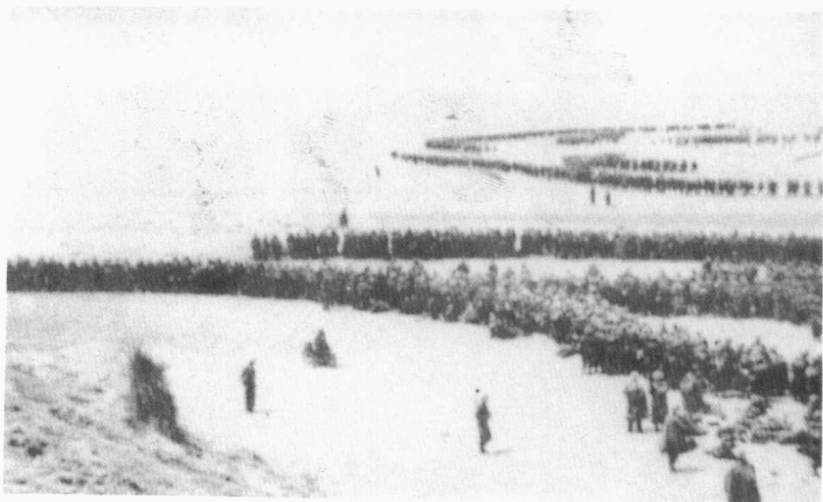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ISBN7-212-01189-4/K·359

定 价: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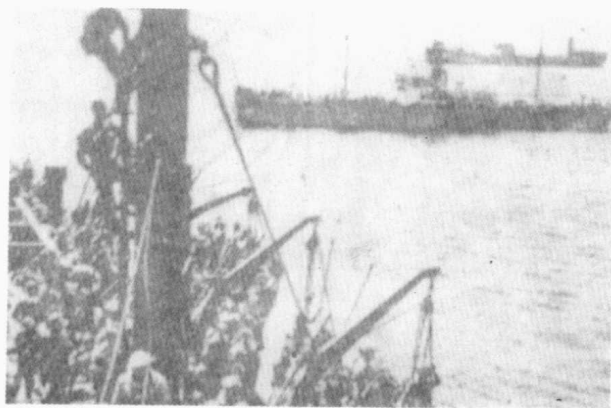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08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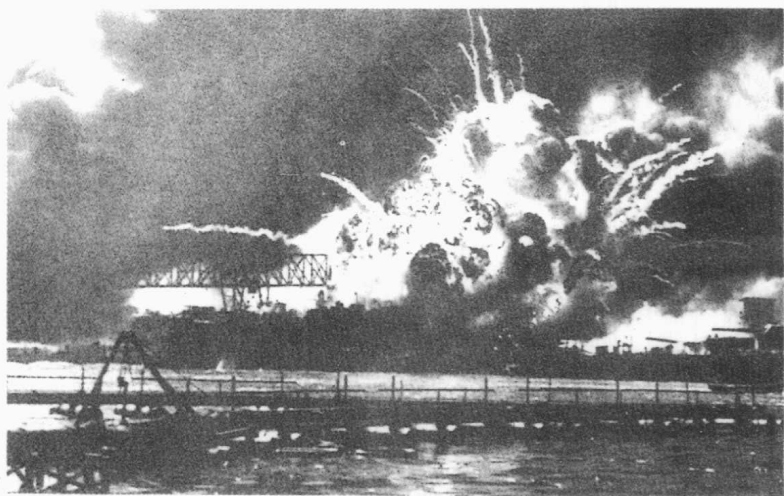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聚集在  
敦刻尔克海滩等  
待撤离船只的英  
军和法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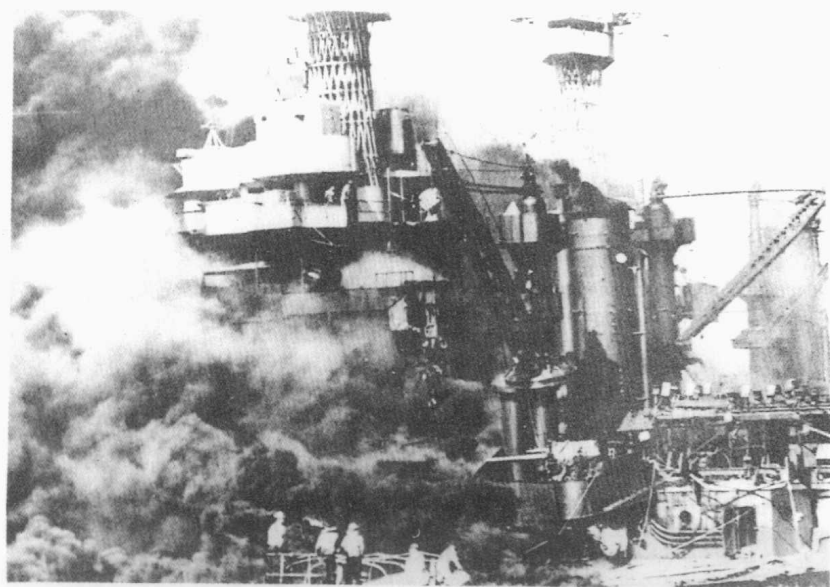


(左下)满载  
撤离船只的英国  
船只。



(上)在日本飞机的袭击下,珍珠港内的美国军舰爆炸起火。

(下)一艘美国战舰正在爆炸,即将倾复沉没。



(右上)“七  
·二〇”事件中  
反对希特勒的密  
谋组织的领袖贝  
克上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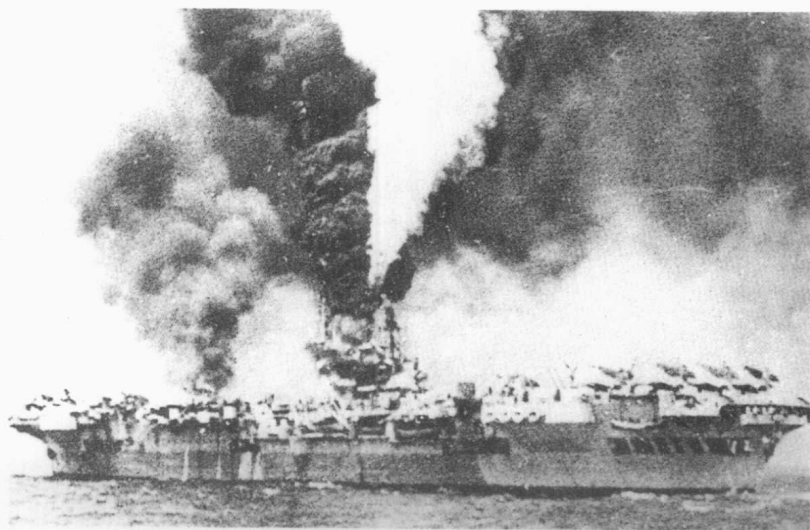
(左下)谋杀  
希特勒未遂的施  
道芬堡上校。





(左上)“红色间谍”左尔格。

(下)日本“神风”队员驾驶自杀性攻击飞机撞上一艘英国航空母舰。



谨以此书：

献给在反法西斯战争  
中浴血奋战的英雄人  
民及献出生命的英勇烈  
士……



## 目 录

|                   |       |
|-------------------|-------|
| ●“卡廷森林事件”始末 ..... | (1)   |
| ●敦刻尔克大撤退 .....    | (18)  |
| ●神秘的赫斯飞英事件 .....  | (39)  |
| ●奇袭珍珠港 .....      | (55)  |
| ●意大利军事政变 .....    | (73)  |
| ●“神风特攻队”的覆灭 ..... | (90)  |
| ●刺杀恶魔希特勒 .....    | (104) |
| ●华沙起义悲歌 .....     | (128) |
| ●扑朔迷离的伯尔尼事件 ..... | (150) |
| ●稀世谍王佐尔格 .....    | (176) |

# ●“卡廷森林事件”始末

## 一、大批战俘神秘“失踪”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集中了62个师的强大兵力，在2800辆坦克、6000门大炮和2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所谓“闪击战”，突然入侵波兰。

9月17日，在德军入侵波兰的两周之后，也即苏德条约签订的3周之后，苏联出动了60万人的军队（科瓦廖夫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铁木辛哥的乌克兰方面军）进军波兰，一直向西推进200—300公里，到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一线，同德军会师。在作战中，波兰军队对于来自东方的进攻并无足够的准备（为期10年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自1932年7月25日起生效，至此远未到期），其武装力量被解除武装。伦贝格（今利沃夫）波兰守军（司令为兰格内尔将军）等向苏军投降。此时，越过苏德条约秘密议定书规定势力范围分界线的个别德军部队，当即奉命撤退到该线以西。苏军占领了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总计有21.5万名波兰官兵被苏军俘虏，其中约有1.5万名波军现役和预备役军官。这一大批军官被分别送到奥斯塔什科夫（约6500人）、科泽尔斯科（5000人）和乌克兰的斯塔罗别尔斯科（4000人）三个劳动营里。

1940年春季，关押在上述三个劳动营里的波兰军官突然“消失”了。

1941年6月21日，希特勒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同年7月30

日,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双方签署了在反法西斯德国战争中相互帮助的协定。苏联同意归还关押的波兰军人,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军队,指挥官由波兰政府委派,在作战方面由苏联最高统帅部领导。西科尔斯基任命安德斯将军为在苏联的波军总司令,他认为安德斯具有在1939年波德战争期间指挥军队的经验。安德斯获释出任此职。随着苏联境内波兰军队的建立(到1941年10月25日,人数已达4.15万人。12月西科尔斯基向苏联政府建议,把波兰军队扩大到9.6万人,由两个师扩充为6个师),指挥人员严重不足,这更使人们想起被俘关押的波军军官。据一名叫作恰普斯基伯爵的波军上尉回忆说,他于1941年9月2日获释后,曾试图找寻昔日的战友,而几经周折只得悉几百人的下落,其他人则杳无音信。1990年时,他还在世,已是90高龄了。他意识到,“其实,当时我要找的人已经死了”。

波兰流亡政府对被俘波兰军人的命运理所当然地十分关心。1941年10月13日,波兰流亡政府驻苏大使科特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询问失踪和被拘留的波兰军官的下落。10月15日,西科尔斯基又直接向苏联派驻伦敦波兰政府的大使鲍戈莫洛夫问及此事,该大使竟回答说,那些波兰人已被释放。12月份西科尔斯基访问莫斯科期间(当时双方于12月4日共同发表了“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声明),亲自向斯大林陈述了关于释放关押在苏联劳动营中的波兰军人的要求,以便让他们根据波苏军事协定加入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波兰政府还为此专门整理了一个文件汇编。其中第一部分叙述这些军官被俘后的遭遇(直到1940年春天他们失踪时为止);第二部分载有波兰政府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先后发出的8封询问失踪波兰军官下落的正式信函,以及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1年11月3日就这一问题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但是苏联在答复中,从来没有明确说出,也没有暗示这些军官的真实去向。

从那时起,有关这批波兰军官命运的真相,许多人极为关注,但始终不得其解。

## 二、“万人冢”意外发现

1943年春天,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转折迹象之时,出人意外地爆出了一则震惊世界的国际新闻,并因而导致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以及苏联和波兰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互不信任和彼此不和的气氛。

4月初,一个隶属于德国作战工兵师的称作“托特”的机构的几名工作人员,在尚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大坟坑。坑内埋着大批尸体,全被反绑着双手,而且都是脑后中枪致死,分别埋在几个坑内,口袋里装着身份证明。死者一概是军人,他们身上穿的军装既不是苏军制服,也不是德军制服。纳粹分子进行了一番调查,很快认定这批死难者正是苏军占领波兰后俘虏的波兰军官,估计人数在5000左右。于是,纳粹分子便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反苏宣传攻势。

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这则消息,宣告说:“在莫斯科西南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一批埋有近万名波兰军官的群葬墓。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杀的。”“据查证,他们全部是由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屠杀的。”人们这时对于纳粹故弄玄虚的宣传伎俩本已不以为奇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又是举世瞩目的焦点,柏林的广播还真起到了石破天惊的作用,世人为之哗然。

仅仅事隔两天,即4月15日,苏联政府就发表了一份公报,指责德方“捏造”。公报具体解释说,1941年这些战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从事建筑工作,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又过了两天,即4月17日,苏联新闻局发布了另一份公报,其

中说，纳粹可能于 1941 年就已屠杀了这些战俘。

就这样，一场力图证明对方是杀害波兰军官的刽子手的争论在苏德之间展开。

为了证实自己的广播并非“捏造”，德国人把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三个地区的波兰人代表团用飞机送到卡廷森林现场参观。接着，德国人又要求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指派一个委员会参加挖掘尸体的工作。国际红十字会接受了这项建议，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关三方——波兰政府、苏联政府和第三帝国（德国）都同意进行这样的调查。按说，苏联政府应当乐于支持这样的调查，但是它却断然予以拒绝，而且给波兰流亡政府发去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断绝了同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

不久，德国方面又安排了一个由法学专家及其他专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到卡廷森林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从离原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的一幢别墅不远的 8 个坑中共掘出 4243 具尸体，其中有一名女子，是波军的女飞行员。由于天气炎热，未等到最后一个坑挖掘干净，德军下令结束工作。估计最后那个坑内还留有几百具尸体。到场的科学家们对尸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根据尸体埋葬的时间（约为 1940 年 4 月到 5 月中旬，那时德国尚未入侵苏联）、用以枪杀这些战俘的子弹（确实是德国制造的，但那个批量是德国在 1930 年以前卖给苏联的），以及他们身上其他伤口的形状（用的凶器是典型的俄式三棱形步枪枪刺），可以认定屠杀是苏联人所为。调查结果证实了德国人的说法。当时随这个国际委员会前去现场直接观察的，还有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军官。他们本以为这样的恐怖暴行不会出自苏联人之手，但经过仔细地参与调查，他们也深信不疑地认为，这一切都是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犯下的罪行。在此基础上，纳粹德国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此事大加渲染，一场谴责苏联的浪潮正在悄然兴起。

然而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43年9月,苏联军队实施了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利战役,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纳粹德国的宣传运动也就销声匿迹了。

不过,斯摩棱斯克的光复给了苏联一个端正视听的机会。斯大林当即责成贝利亚迅速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澄清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情况”。

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主要由苏联的高级军官参加,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什维尔尼克的率领下,离开莫斯科去斯摩棱斯克实地调查。但在委员会调查之前,贝利亚早就派人前去精心作准备。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支队伍先把附近村庄的居民不论男女都召集起来进行布置,然后又从中挑选出一批合适的人,告诉他们:“凡是恰好碰到德国人把战俘押到森林里去枪毙的村民”,应该自愿为即将来到的委员会提供情况。其中又有一些人则受命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预先拟好的内容逐字逐句背诵下来,以便应答。这之后,委员会来到卡廷森林呆了几天,会见了事先训练好的村民,然后返回莫斯科去了。很快,一份《医学及法律专家调查报告》也公诸于世,当然毫无疑问是经过贝利亚核对和批准的。

随后,贝利亚又导演了这出戏的第二场。第二场应当是重头戏,因为主要内容是邀请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到现场参观。他确实希望能给外国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哈里曼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凯瑟琳随同记者们前往,获得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凯瑟琳在伦敦时曾先后在国际新闻社和《时代周刊》担任记者,到苏联后在战时新闻局驻苏办事处工作,后任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在大使的要求下,她获准同一大群西方记者一起乘火车去斯摩棱斯克,在向导带领下对卡廷森林的群葬墓穴进行了一次“可怕的”参观。凯瑟琳的印象是:“此行的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的尸体是德国人1941年夏末或秋天枪杀后掩埋的,并不是像德国人

先前指控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大墓，然后又看了俄国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的解剖。尽管天气很冷，恶臭仍然是无法忍受的。在解剖帐篷里，俄国医生身穿白色工作裙，手戴橡皮手套，把一块块脑子或肝脏放在餐碟里展示，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像是要确定那个论据：波兰人是在1941年被杀的。幸亏凯瑟琳那天伤风，因而不像别的人那样深受恶臭之苦。

凯瑟琳小姐还很年轻，并不具备轻易识破别人骗局的经验，更不用说要她来拆穿贝利亚的诡计了。但她去了一趟斯摩棱斯克之后，却还是发现了不少令人狐疑的蛛丝马迹。她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陈述自己的看法。她说：“见证人是事先经过充分练习的。他们把要讲的话一一背出来，似乎并不慌张。听完最后一个人的叙述后，我们便开始提出一般性的问题……然而没有多久，苏联外交部新闻司的工作人员就站起来说，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因为我们要坐的火车就要开车了。”

凯瑟琳·哈里曼在访问卡廷的几天之后，写信给丘吉尔的儿媳帕梅拉·丘吉尔，描绘了苏联人如何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表面上似乎可以定罪的文件。“当我正在注视时，他们发现了一份日期为1941年夏天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足以让人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有的死者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报》。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的论点——波兰人是在1941年6月德国人入侵之后被杀害的——相抵触。”

关于“委员会”听取证人陈述的情况，给哈里曼小姐的印象是“细节丝丝入扣，而按美国的标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同时，西方记者不得对5个证人中的任何一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像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当被询问时，有几个证人踌躇迟疑或言词闪烁、结结巴巴。记者们自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报道苏

联人给他们看了什么,而不能自行判断。他们望着一块块机体组织,几乎没有资格断定这是取自死了2年半的尸体,还是取自死了3年半的尸体。不过这种令人恐怖的证物展示还是安排得很有条理,似乎说明那场杀戮是德国人的罪行而非出自苏联人之手,尽管当时的证据依然混乱和自相矛盾。因此哈里曼小姐说:“人们预料我们会认为苏联高级官员的声明是真的,因为他们说这是真的。尽管如此,我的看法依然是:波兰人是德国人杀的。”

与哈里曼小姐作伴前往参观的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梅尔比也被这类证据搞得很伤脑筋。他报道说:“显然,苏联人的论据在若干方面是不完全的,是拙劣地凑在一起的,而且这场戏是为那些有机会进行独立调查或核实的记者们演出的。然而,总的说来,尽管有些漏洞,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好多记者对一件事都有深刻印象:几乎所有例子,只有很少例外,发掘出来的尸体都是只在头盖骨的底部有一个枪弹洞眼。苏联人说这是典型的德国手法。但是,看来大部分是士兵的尸体,而不是德国人在一年前所说的军官尸体。他们的制服上没有军阶。记者还一致反映,在他们返回途中,陪同的苏联外交部官员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他们表态,以便确认都信以为真了。

1944年1月,苏联报纸按计划发表了“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报告声称:被俘波兰军官早在1940年就由苏联把他们从科泽尔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棱斯克的3个“特别营地”。1940—1941年期间,他们在那里从事建筑和修路工程。德国人入侵时,这批战俘未能及时撤退,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手中。那年秋天,德国人对逃散在那个地区的波兰战俘进行了严密搜捕,然后把他们一小批一小批地押到卡廷森林,由一支代号“第537工程营”的特种警察部队加以处决。尸体当时就埋葬了。但是到了1942—1943年冬天,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决定利用这些坟墓来进行挑拨。他们威胁当地人提供假的证词,同



时掘开坟墓，拿走所有写有 1941 年日期的证件，以便诬陷苏联人屠杀波兰军官。报告还说，根据法医检验，这批战俘被枪决时用的是典型的德国方式。尸体总数为 1.1 万具。

苏联官方一再强调，“特别委员会”的这一报告充分说明，德国人应对卡廷事件承担责任。战后，苏联政府还在卡廷森林竖起一块纪念碑，以纪念“1941 年被希特勒匪徒枪杀的波兰军官”。

就这样，苏德双方都进行了有国际人士参加的调查取证和尸体发掘、检验工作，各自有了一批足以指控对方、洗刷自己的人证和物证。国际舆论也颇不一致，各自支持一方。至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去现场参观调查的人们，更是难辨真伪，不得不像凯瑟琳小姐和梅尔比先生那样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无法决断的窘境。“卡廷森林事件”终于作为一桩历史悬案留在人们心中。

### 三、波兰始疑终信，与苏联破裂

起初，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当局并不相信纳粹德国的广播，认为这一切都是希特勒分子惯用的宣传手段。不久，他们的观点发生根本变化。这个政府所属的地下组织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科莫罗夫斯基派人去现场秘密作了调查，带回一些在当地找到的被俘波兰军官的日记。各方面的证据使波兰人确信：在卡廷森林发现的确实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他们被杀害的时间大约在 1940 年初，那时这一带还在苏联人手中。稍后，波兰红十字会的人员又参与了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使死者的身分和有关情况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于是，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于 1943 年 4 月 16 日向国际红十字会公开发出呼吁，要求对卡廷惨案进行公正的现场调查。第二天，4 月 17 日，波兰流亡政府的国防部长发表了一份公报，详细叙述了这批军官“失踪”的始末和波兰当局长期以来为从苏联方面获知他们的下落所作的努力，以及迄今未得到苏方具体答复的实情。公报宣称：波兰政府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要求“由